

人神之间

炎黄二帝之谜

现在我们称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，把炎黄二帝共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无论是历史典籍还是神话传说，都有许多关于炎黄二帝的记载，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。那么炎帝和黄帝究竟是怎样的二位？他们是人还是神？这些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。

根据《国语·晋语》少典氏娶有蚺氏之女，生下黄帝和炎帝，而少典究竟为氏族名还是父名，则众说不一。习惯上称中华民族为炎、黄子孙，而炎、黄是列为五方天神的五帝中的二位。

炎帝和黄帝，过去被说成是像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天子或秦、汉以后的皇帝那样的远古时期的帝王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说：“黄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名曰轩辕。”《国语》的说法有所不同，说黄帝在姬水边长成，因而姓姬。《史记集解》说黄帝号有熊氏，可能是以熊为图腾而得名。《龙鱼河图》说“天遣玄女下，授黄帝兵信神符，制伏蚩尤，……以制八方”。在早期部落之间的战争中，黄帝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有功绩的。功绩还不止于此，《史记正义》说：“黄帝以前，未有衣裳屋宇，及黄帝造屋宇，制衣服，营殡葬，万民故免存亡之难”^①，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，皆收采禁捕，以时，用

之有节，令得其利也。”为什么称他为“黄”帝？据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记载：“东方木也，其帝太皞，其佐句芒，执规而治春；南方火也，其帝炎帝，其佐朱明（即祝融），执衡而治夏；中央土也，其帝黄帝，其佐后土，执绳而制四方；西方金也，其帝少昊，其佐蓐收，执矩而治秋；北方水也，其帝颛顼，其佐玄冥，执权而治冬。”也就是说，黄帝为五天帝之中央天帝，是管理四方的中央的首领，又因专管土地，而土是黄色，故名“黄帝”。

至于炎帝，也为少典之子，与黄帝兄弟相继，但《帝王世纪》认为炎黄之间凡隔 8 帝 500 余年。汉高诱注《淮南子》，说赤帝就是炎帝，少典之子，号神农，南方火德之帝。或说炎帝是生活在姜水一带的部落首领。《世本·帝系篇》把炎帝和神农氏连到了一起，认为炎帝即神农氏，炎帝身号，神农代号。班固说炎帝“教民耕农，故号曰神农氏”。对古老的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。

传说最初炎帝做了华夏族的帝王，黄帝只是炎帝属下的诸侯。关于炎帝的事迹，古书中有一些不同的记载，一般多把炎帝与神农氏说成是一个人，如《帝王世纪》即说“炎帝神农氏”，因此，像教民食五谷、创制耒耜等农业发明的功绩，也就自然归于炎帝身上了。据说炎帝一族传了八代，共五百三十年，“无制令而民从”，完全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。但是传到了第八代炎帝榆罔时期，“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”，可是榆罔却不能阻止，而且后来榆罔也开始不断“欺凌诸侯”，于是，诸侯纷纷脱离榆罔，归顺于黄帝。黄帝修明政治，整顿兵力，鼓励生产，安抚百姓。经过一番准备，率领诸侯在阪泉（相传在今河北涿鹿东南，一说在山西运城）与炎帝榆罔交战，经过三次大战，终于打败了榆罔，黄帝遂取而代之，做了帝王。也有人说黄帝与炎帝本是兄弟，所以双方的部落联盟很快融合为一，后世称炎黄子孙，来源于此。之后，黄帝又经过一系列南征北讨，制服了不顺从的诸侯，天下复归于太平。黄帝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治理天下，得到了人民的拥戴，农业生产得到发展。传说黄帝还创造发明了舟楫、杵臼、弓箭、

房屋、门、棺槨、文字，为华夏文明的发展立下了卓越的功勋。

有关黄帝神话传说的主要部分，莫过于黄帝与炎帝、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了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中，黄帝“帅熊、黑、狼、豹、貔、虎为图腾的部落为前驱，以雕、鹞、鹰、鸢为旗帜”战争的规模显而易见。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则异常惨烈，“血流漂杵”。在这场战争中，双方都施出了神功魔法。起初，蚩尤施展法术，即刻大雾弥漫，人马相对而人影莫辨。黄帝便令风后制造出指南车，识别了方向，将蚩尤打败。随后，蚩尤又请来了风伯、雨师，一时间，风雨大作，急风暴雨把黄帝的人马搅得人仰马翻。黄帝又请来了天女“魃”，止住了暴雨，指挥大军以雷霆闪电之势，冲乱了蚩尤部下的阵形，乘胜捉住了蚩尤并把他杀掉，将其头颅埋在涿鹿。至今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的涿鹿县，还有一座蚩尤坟。

炎帝、黄帝作为功绩卓著的贤明帝王，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尊敬。炎帝、黄帝死后，黄帝的一些后代子孙如颡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等，又先后做了帝王，他们不忘炎帝、黄帝对于华夏文明的开创之功，把炎帝、黄帝奉为始祖，率领臣民依时节祭祀、供奉。这样，炎帝和黄帝就成了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了。后来，由华夏族发展而成的汉族、中华民族，也继承了这一传统，一直尊奉炎帝、黄帝为始祖，于是也就自称为“炎黄子孙”了。

从现代历史科学的观点来说，炎帝、黄帝的时代，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，阶级和国家还没有产生，也没有如后世那样的帝王。当时，中华大地上分布着许多氏族和部落，这些氏族和部落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，有相互通婚的姻亲关系，有祖族与支族及支族之间的血缘关系，有生产生活中的睦邻友好关系，也有相互争战的敌对关系。由此而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集团，其中中原部落联盟（即华夏族）最为强盛，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都属于这一部落联盟，炎帝和黄帝还先后担任了部落联盟的首领。

根据古史记载的内容来看，有专家认为炎帝族和黄帝族原来都

是少典氏族中分化出来的支族。这种祖族与支族的关系，由于后人理解，故在古书中记载为父子关系。炎帝族从祖族中独立出来后，很快便兴盛起来，成为中原部落联盟中颇有影响力的骨干族，他们的首领炎帝也就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。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先后继任的几位炎帝族的首领也都担任了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职，并且承袭了“炎帝”这一称号。因此，这时期可称之为炎帝时代。几百年以后，炎帝族渐渐衰弱了，黄帝族却强大起来。这个时候的炎帝榆罔利用部落联盟首领的职权，欺凌一些弱小的部落和氏族，这些部落和氏族便逐渐脱离了炎帝族，黄帝遂取代炎帝做了新的部落联盟首领，从此开始了黄帝时代。

一些学者指出，炎帝和黄帝的时代，相当于距今七千年到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。这是中国中原远古文化取得大发展的一个时期，原始农业文明繁荣，还有许多重大的发明。这些成就是当时人们共同创造的，可是在历史的传说中，往往把这些成就归之于时代的代表人物，即当时的部落联盟的首领炎帝和黄帝身上，因此他们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人，受到普遍尊敬。早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，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，就形成了华夏族、苗族以及当时被华夏族称之为蛮、夷、戎狄的许多兄弟民族。说华夏族为黄、炎之后，这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族是由黄帝、炎帝为代表的两个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。所谓帝，只不过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军事首长的称谓。

有人认为这个传说中的黄帝是个神，但也有人认为黄帝是真实的存在过的一个历史人物。黄帝究竟是人还是神？其实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。

我国一些著名的神话研究专家认为，黄帝为一神话传说中的人物。他起于雷电，最初之神职为雷神，后以雷神崛起而为中央天帝。“相传他长有四张脸，能同时顾及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。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事情，总逃不过他的眼睛。”最后，黄帝战胜了其他四天帝，

而建立了自己的神国。

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合并后，统称为华夏族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前身。黄帝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，便教导人们伐木筑屋，他发明了舟车、弓箭，还造字制乐、编历法医学；他的妻子螺祖则教民众种桑养蚕，缝衣作冕，创造了中华的原始文明。直至今日，人们常用“炎黄子孙”来称呼中国人，这也反映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炎帝和黄帝的追溯与尊奉。



黄 帝 陵

另有专家认为，黄帝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历史人物。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 黄帝生下来就很神奇灵异 襁褓中就能说话 显示了其与

众不同的禀赋。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，则是各部落间战争纷起的年代。黄帝以其聪明才智，将他周围的部落团结起来，结成部落联盟，并成为他们的军事领袖。他修明政治，整顿武备，征伐四方，最终战败蚩尤，兼并炎帝部落，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。统一后，他制礼仪，施教化，创立法规典章，作为治世准则，并遣官员到各处治理天下。实际上，他是以战争手段结束了各部落联盟间的长期混战，建立了早期国家的雏型，从而开始了中华文明历史的新统一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。

黄帝部落聚居的地方，历史记载也各有不同。有记载说，他曾居住在河北涿鹿县，史称“涿鹿之野”；又有记载说，他的部落居住在今河南新郑一带，名曰“轩辕之丘”。这说明当时部落大约还没有完全定居，经常迁徙。黄帝部落大体活动于今天陕西、河南、河北沿黄河一带。

更有学者认为，“黄帝”的名称实际上反映了原始农业文明时期，人们对黄土地崇拜的一种特殊感情。黄帝所处的时代，我国华北及全国大部分地区，已普遍进入农耕时期。黄帝征服各部落后，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生产。他命羲和占日、常仪占月、臾区占星气、大挠造干支、容成造历法，并按天时，审地利，播种百谷草木，并教民节用水火材物，他还专门设立土地种植之官“后土”。这一切都使得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因此，古史记载他为“以土德而王”，因土地为黄色，故而称为“黄帝”。这种因对土地的崇拜而衍生的黄色崇尚，在后代的历史中进一步发展。后世的帝王们都要依据黄帝的故事，“数用五，服尚黄”，从而逐渐将黄色演变成为一种权力和尊贵的象征。

炎黄二帝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没。在他们的身上，同时凝聚了许多神话传说的影子。关于黄帝之死，历代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。据说，黄帝并没有死，而是乘龙升天了。现在陕西黄陵的围墙正面，还有一块石碑，上书“桥山龙驭”四个大字。这也反

映了人们对他的—种尊敬和爱戴，对他的部族和后代们的美好祝愿。

著名学者冯天瑜指出，中华民族的远祖，可大致分为华夏、东夷、苗蛮三大集团。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，大致在今天的山东、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—带，即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和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。传说中的太皞、射日的后羿及与黄帝恶战的蚩尤，都属于这个集团。苗蛮集团主要活动在今湖北、湖南、江西—带，即大溪文化、屈家岭文化分布区，东部的河姆渡文化、良渚文化也可归于此集团。著名的伏羲、女媧及三苗、祝融氏，都属于这个集团。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，后沿黄河东进，散布于中国的中、北部部分地区，大约相当于今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。华夏集团以黄帝和炎帝两人为主。这三大集团之间，既有和睦共处的安定，也有大动干戈的战争。后来黄帝兼并炎帝部落，统一其他各部。黄帝、炎帝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，华夏集团也因为其连续的胜利，巩固了自己的主流地位，成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代表。

前赴后继

鲧禹父子治水之谜

根据《尚书》、《史记》等书的记载，鲧奉命治水，用水来土掩的办法，结果失败被杀。禹继父职治水，劳身焦思，终于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，大获成功。其子启在大禹的基础上，开创了中国第一个有阶级的王朝。但有人提出，鲧真的是因治水失败而死的？

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，中国的黄河流域曾经频繁地暴发洪水，给当时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灾难。据说当时洪水浩荡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说：“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。”《尚书·尧典》也谈到：“汤汤洪水方割（害），荡荡怀山襄陵，浩浩滔天。”这么大的洪水必然造成房屋倒塌，田地被淹，五谷不收，许多人被淹死了，活着的人只好逃到山上去。水患为害人类的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，到了禹的时代，还是“十年九潦”。面对肆虐的洪水，中国古代先民与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，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。

相传共工氏族就是长期与洪水作斗争，他们的图腾、首领名号，都用水族动物表示，可见他们的生活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他们居住的地区，十分之七是水域，陆地只占十分之三，长期与水打交道的历史，使他们积累了一些经验。他

们在首领的带领下，采取从土丘上取土填充低洼地的办法，加高自己的居住区，从而避免了洪水的侵袭，减少了损失。可是，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，要想靠原始的木器、石器、蚌器工具，将居住地加高加固到足以防御较大的洪水侵袭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而且，将自己的居住地加高后，会逼使水流冲向其他的氏族或部落，这就引起了其他氏族、部落的反对。后来，唐氏族干脆把共工氏族灭掉了。不过，共工氏族遗存下来的后裔，还在后代的抗洪斗争中发挥了作用。

尧作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，水患也很严重。尧召集各部落的首领，共同商讨治水之策，大家共推鲧领导治水。鲧借鉴了共工氏族治水的经验，把共工氏族加高整个居住区的作法改为在居住区周围修筑土围墙，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工程的土方量。因为他修筑了较高的围墙，后世遂留下“鲧筑城”、“鲧作三仞之城”的记载。有了这种土围墙，不仅可以防御小的水患，遇到稍大一些的洪水，也可以采取临时加高加厚土围墙的办法，保住村落。后来的传说中，把这种水涨墙高的事实加以神化，说成是鲧从天帝那里偷来了一种可以自己生长的“息壤”用来阻挡洪水，所以在洪水到来之时，土围墙就不断增高。当时修土围墙，是采用夯筑的办法，并不十分坚固。遇到大洪水或被洪水长时间包围浸泡，还是不免一溃，伤亡是很惨重的。后来，舜作了部落联盟的首领，以治水无功的罪名把鲧处死了。

舜处死鲧后，又任命鲧的儿子禹领导治水，并派商族的始祖契、周族的始祖弃、东夷族的首领伯益等人协助他治水，据说共工氏族的后裔四岳也参加了治水工作。禹对于父亲治水无功而被处死十分伤心，同时这件事也加强了他克服困难、治服洪水，完成先父遗业的决心。他认真思索了前人治水的经验和教训，然后带领助手们进行实地考察，以便找出最佳治水方案。在考察过程中，他们风餐露宿，跋山涉水，察看山川水势，并沿途作了许多标记，有的是在树上砍凿出痕迹，有的是在地上堆积一些石块，给日后治水标示出大致的施工基准线。根据考察的结果，禹决定采取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方案，他带领

着百姓，利用枯水季节疏浚河道，把挖出的泥土堆到岸边的高地上。这样，在洪水季节水流就可以顺畅地流走，岸边的居民区也不易受到洪水的威胁了。

治水的工程持续了许多年，《孟子·滕文公》记载“禹八年于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”，《史记·夏本纪》记载禹“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”，总之，治水工程是既漫长又辛苦的。长年在外辛劳，使禹的脸晒黑了，人累瘦了，连小腿肚子上的汗毛都磨光了，脚指甲也因长期泡在水里而脱落。有时在泥水中干活，浑身泥乎乎的，看起来像只熊，后人遂有“禹化为熊”的传说。

经过多年的奋斗，禹领导着人们疏通了黄河流域的一道道水系，消除了一处处洪水的隐患。在这一系列的工程中，最艰苦、最困难的要算是“凿龙门”和“辟伊阙”了。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和陕西省韩城县交界处，是黄河出晋陕大峡谷流向中游平原的一个关口，由于岸边有两座大山夹峙，河道变窄，水流不畅，易暴发洪水。禹带领人们用简单的木制、石制、骨制的工具，凿宽了河道，消除了隐患。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伊阙，也是经过一番开山掘谷的奋战，才使水道畅通的。

治水的成功，使人们重新拥有了正常安定的生活，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，因此人们非常感激带领大家治水的禹，尊称他为“大禹”，传颂着他的事迹。后来，舜就把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传给了大禹。

上述治水的传说，发生在尧、舜任部落联盟首领的时期。这时期正是中原龙山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，原始农业文明很发达，人们在临近水源的河谷地带开垦了大片农田，兴建了众多的居民点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。然而，这一发达的原始农业文明又有其脆弱的一面，河谷地带固然利于开垦，也利于农作物的生长，但是同时，它又十分容易受到洪水的侵袭。而在尧、舜的时期，偏偏降水量增加，暴发了几次大洪水（小的水患就更多了），给人们的生产、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，许多人死于洪水之中。后世关于洪水的记载，正是以这些水患

为蓝本的，只不过在长期的传说中被夸大了很多。面对洪水的侵袭，人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，从中得出了不少经验教训，并没有从适宜耕种的河谷地带退却，而是继续发展了自己的文化。

大禹治水的成功，古代文献中说成是治理整个黄河流域，这是一种大大夸张了的说法。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，不要说治理黄河，就是把一条小河流导入江、海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禹治水的功绩，可能是修筑了一些堤堰阻挡洪水，对某些小河道进行了局部疏导，以及洪水到来时引导人们迁往高地躲避等等。大概在大禹的时代，持续了约一百年的多雨时期已经过去，转入了较为干旱的时期，洪水因之减少，人们也把它当作是大禹的功绩了。长期以来，传说中的大禹，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远古时期治水英雄的代表，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与大自然斗争的顽强精神的化身。

已如上述，鲧禹父子两人，一个是治水失败者，一个是治水成功者；一个因“绩用弗成”而成为治水罪人，一个却是人们讴歌的英雄，这在古代的史书中已有明确的描绘，自东汉以来，这样的说法盛行不衰。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，鲧并不是因为治水不力被杀，大禹治水的方法也不见得比鲧高明到什么地方去。

闻一多先生在《天问疏证》中对大禹治水已有怀疑：“早期治水传说，鲧禹人分二法。”他认为父子两人用的治水方法是一致的。近年来，有很多学者更是对闻一多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，认为鲧禹治水，方法相同。他们治水采用的方法都是湮（堙），即填洪水，在他们那个年代，不单是他们还不懂得疏导和壅防，其他人也不懂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当时论治水之功时，人们鲧禹并称，到了三代时将鲧禹并祀为神。他们认为在早期的神话传说中，鲧禹并无贤愚之别，功过之非，在那个时代决定了他们治水方法的相同。然而，鲧禹两人却有着不同的遭遇，原因并不在治水而出于政治的方面。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，他的所作所为大概都在破坏着这些因袭的习俗和制度。唐虞之际是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晚期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，在新旧

交替的历史转折点上，往往是适合旧传统、旧习俗、旧势力的人物时时得胜，而进取者、革新者不免一时受挫，甚至付出血的代价。今天所见的鲧禹事迹的传说，大都见于先秦诸子和汉儒们“言必称尧舜”的著作中，所有的罪恶过失当然都加到了鲧的头上，所有的功德圣业都加到了禹的身上。

持这种观点者认为，人们认为鲧只堙不导，是没有科学根据的。堙和导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措施，单纯用哪一种都不会有成效，堙和导是在治水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的不同方法，不能一味用堙的办法。在鲧之前，最早开始用堙的方法来治水的是鲧，以尧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因为对鲧部落中发生的变革看不顺眼，因而鲧被加上了“以乱天常”的罪名，这就是上古治水中崇禹贬鲧的原因。

更有一些学者对大禹治水深有怀疑。近代西方史学家夏德在《支那太古史》中，对史书中说大禹的“决九川，距四海”认为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他认为开挖长江、黄河和汉水的工程量，比修万里长城的工程量还要大，这根本是不切当时实际的。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大禹治水仅是当时的人们利用水利，求得生活的安全和生产的便利的情况下产生的，治水的目的只是谋求安全的栖息之所，并不是大规模的疏浚河道。

到底哪种说法为真？看来关于大禹治水仍是一头雾水。

权力的象征

帝王九鼎之谜

大禹治水成功，被奉为一代圣贤，但他违反了部落联盟的传统，建立了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，并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。随着王朝的更迭，九鼎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。然而，到了秦汉之间，九鼎却不见了踪影，由此人们怀疑九鼎到底真的存在吗？

我国古代青铜工艺高度发达，传下了许多稀世之宝。然而就历史价值而言，却没有一件比得上传说是大禹所铸的九鼎。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“问鼎”，建立政权称为“定鼎”，就是因为三代以来，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。

根据《左传》鲁宣公三年记载，夏朝初年，令九州州牧贡铜，铸造九鼎，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，然后分别刻于鼎身。九鼎铸成后，陈列于宫门之外，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往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，以避凶就吉。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，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。九鼎一出世，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其实，透过神话因素，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。夏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，再以九鼎象征九州，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，实现了天下一统。此后，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。传说夏亡之后，鼎迁于商，商亡之后，鼎迁于周，表明天命之所归。

春秋时期，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，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产生了觊觎之心，而由楚国首先发难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楚庄王八年（前606），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，路经洛邑，特意摆开阵势，显示武力。周定王连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。楚庄王咄咄逼人，劈头就问九鼎大小轻重如何。王孙满冷冷地说：“在德不在鼎！”接着又不紧不慢地回顾了九鼎转手的历史，并说如果本质美好光明，鼎虽小而犹重，反之，虽大犹轻。他进而指出：“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”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，只好作罢。这也就是成语“问鼎中原”的来历。

到了战国后期，周王室已是奄奄一息。据《战国策·东周策》所载，周显王时期，秦国兴兵临周，企图夺取九鼎。周求救于齐，迫使秦国退兵。但强秦岂肯善罢甘休，后来秦昭王终于灭掉了东周。

围绕着九鼎，有二个问题后人至今难以弄明白，一是大禹是否铸鼎，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连，即九鼎的最后下落。

上引《左传》说九鼎铸于“夏之方有德”之时，而《史记》把铸鼎的时间略有提前，说成是“虞夏之盛”之时，并明言大禹是收了九牧之金而铸九鼎的，本意是象征九州。《墨子》说鼎铸于夏后启时。上述说法大体相近，得到了后代许多人的赞同，基本上认为鼎是大禹所铸，时间在夏朝建立的时候。

怀疑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并没有从周室夺到九鼎，相反关于九鼎失踪的传闻到有鼻子有眼。汉灭秦，也没有见到鼎。刘邦登位时，秦王子婴交出的只有皇帝玺。《战国策》说周得九鼎时，每一只鼎要有九万人来搬运，九只鼎要有八十一万人来运输，这可能吗？近代古史辨派学者认为《战国策》多夸大之辞，禹铸九鼎是不可能的事实。

也有学者根据当代的考古挖掘，认为在夏代以前的一些原始社会遗址中，已经出土过铜器和青铜器。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，学术界公认是属夏王朝时期的，曾出土铜爵、铜鬲等各式形状的铜器，并



毛 公 鼎

且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坩锅片、铜渣和陶范，证明夏人是完全有能力制造铜器的。至少从技术层面而言，禹铸九鼎是可能的。仅凭古史传说的一些缺陷而否认禹铸九鼎，恐怕也不见得是绝对有力。

传承到周朝的九鼎哪里去了？

一些学者发现《史记》中的说法前后不统一。周、秦二本纪都说秦昭王五十二年（前 255）在周赧王死后终于“取九鼎入秦”。《秦始皇本纪》说九鼎在迁往咸阳的途中，有一鼎被大风刮到今江苏的泗水中。据此，除一鼎外，八鼎有可能被搜刮到了秦国宫殿中，应当失于秦亡之后。唐人张守节在《史记正义》中也说：“周赧王十九年，秦昭王取九鼎，其一飞入泗水，余八入于秦中。”然他将秦昭王取九鼎的时间较《史记》本文提前了 41 年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又说：“周德衰，

宋之社亡，鼎乃沦没，伏而不见。”那么九鼎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，与秦无关。后来，《汉书·郊祀志》也是兼收两说，但又说“周显王之四十二年（前 327 年），……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”。以后秦始皇出巡路过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时，派了上千人泗水打捞，结果如同竹篮打水，未能如愿。这说明九鼎并未入秦，至少有一鼎是不知去向。

到了清朝，全祖望、沈钦韩等学者对上述传统说法公开表示怀疑，并作了新的探索。王先谦在《汉书补注·郊祀志》中除引用全、沈二家之说外，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，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：（一）、周人为防止大国觊觎，加上经济困难，采取了毁鼎铸钱的下策；对外则诡称丢失，不知去向。（二）、史载秦灭周取鼎，为时人揣度之辞，并非事实。（三）、秦人谬传九鼎沉入泗水，秦始皇也受到愚弄。这些说法足以发人深思，但未必即为至论。

九鼎既然被周人视为天命之所在，也就只能与社稷共存亡，岂有因大国觊觎而自行销毁之理？况且九鼎铸于夏初，器形不会太大，楚庄王就曾以鄙夷的口吻说：“楚国折钩之喙，足以为九鼎。”（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）可见九鼎之“重”，只存在于传统的神秘观念之中，而不是实物本身的价值。东周统治者能为少量之铜而毁鼎铸钱、甘心自隳天命吗？

纵观古籍中有关记载，对九鼎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说法不一，但并无已被销毁的材料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考古工作的进展。九鼎如失于东周灭亡之前，那么埋没于关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；如失于秦末，那么埋没于关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；要是项羽破秦后载归彭城，那倒极有可能“沦没于泗水彭城下”，但与《汉书》记载的年代又相距甚远。如能将这些问题考辨清楚，对于寻找九鼎的下落，也许不无裨益。

九鼎被作为王权象征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，但它作为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，却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。我们相信九鼎一旦重见天日，必然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！

治水英雄的下落

大禹葬地之谜

今天浙江绍兴的会稽山，传说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一书中说得十分清楚。然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，史学界以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为首提出了怀疑的观点，认为大禹不可能葬在绍兴。真是如此吗？

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，相传是大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的地方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：“禹会诸侯江南，计功而崩，因葬焉，命曰会稽。会稽者，会计也。”这样说来，会稽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“封于会稽，以奉守禹之祀”是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。言之确确，令人不得不信。20 世纪 20 年代，史学界以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为首展开的论争，却使这一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，大禹是否到过会稽成了一桩历史悬案，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。

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所说根本不足信，大禹不可能到达会稽。清代学者梁玉绳在《史记志疑》卷二中认为，大禹巡狩并葬会稽之事，不足依据。当时建国多在西北，不宜独偏江南，若果巡狩所至，总会东南诸侯，并不应远来于越。顾颉刚先生在《讨论古史答刘、胡两先生》中指出：“商周